

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投票行爲*

徐火炎**

本文從「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概念，來說明選民可能應用作為處理選舉情境訊息的一種心理機制，並從政治認知的角度來看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並進一步據以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爲。首先，從本文關於黨派思維結構體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雖然臺灣缺乏深厚的政黨政治的文化與傳統，但在競爭性政黨政治萌芽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隨著選舉與政黨競爭的規模擴大，選民的腦海中已經逐漸發展出「黨派思維結構體」，而用之於政治性(尤其是黨派性)訊息處理的思考與推理上。其次，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與他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政黨印象及政治練達水平等，均具有顯著的影響關係。第三、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情形，對黨派投票抉擇與投票取向，雖沒有直接的影響作用，但透過影響黨派的心理特徵，而具有間接與居中的影響效果。第四、對政治練達水平的探討，則有助於了解選民投票取向的主要差異所在；政治練達水平以政見議題投票的選民為最高，政黨取向投票的選民居次，再次是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而以人際及社會網絡投票的選民為最低。總之，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治練達水平，有助於我們了解選民在面對選舉情境中充滿黨派的政治訊息時，究竟依賴何種政治思考與推理上的「啓發」或判斷捷徑，以作成投票行動的選擇。

- 一、前言
- 二、政治的思維結構體
- 三、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概念與測量
- 四、政治練達的概念與測量
- 五、資料的分析與研究發現
- 六、結論與討論

* 本文發表於「民主化、政黨與選舉」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選舉研究小組舉辦，臺灣大學理學院思亮館國際會議廳，1994年7月8日。在研討會中承蒙評論人陳義彥教授提供許多寶貴的見解，刊登之前並受惠於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與修改意見，特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分析的資料，是臺灣大學政治系胡佛與陳德禹兩位教授共同主持、國科會資助的「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爲：民國八十一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分析」研究計劃(編號NSC82-0301-H002-103)，所收集的全省性抽樣調查的資料。除了感謝計劃主持人與資助機構外，同時也對共同執行研究計劃的同仁與許多資料收集的幕後英雄表示敬意。資料的解釋與分析、文字的不妥或錯誤，當然都是我自己的。

**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1980年代以來，全球性的民主化潮流與社會多元化的變遷，毫無疑問地與George Orwell(1949)在《一九八四》創作小說中所指出「極權政治」當道的預言，乃是一種背道而馳的發展趨勢。但Orwell在書中所描述的無所不在的電子螢幕，卻隨著大眾傳播的普及與電子媒體的發達，而在現代社會中獲得真正的實踐。他所說的主控電子螢幕與負責訊息內容製造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以及銀幕畫面上頻頻出現的所謂「大哥」(Big Brother)，當然也以不同的形式和稱呼出現在民權高漲的現代多元社會中；但可以確信的是，不僅無法如期地塑造出一元化的民意，反而是大眾所不信任的與批判的主要對象。大眾對政治的不信任或批判，無論是出於情感的或認知上的判斷，都可能影響他們在選舉投票日，投下關鍵性的一票。每位選民的一票，對候選人或政黨來說，都是決定選舉勝負的關鍵票；然而，我們也嘗聽說：「選民只有十三歲」，這似乎意味著選民的投票是「不成熟的」；但民主國家的民選官員，在選舉中爭取選票的同時，是否真正相信具有投票權的成年公民，沒有政治上的思考及推理能力？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尚未有明確的答案。這是本文嘗試去分析的出發點。

現代是一個電子媒體發達與資訊爆炸的時代，也是民權高漲與民意主導的時代。但以Benjamin Ginsberg(1986)的話來說，現代民主社會的民衆卻是一羣「被俘虜的大眾」(the captive public)。他認為現代的民主政府處處無不表現順應民意為訴求，結果不但巧妙地改變了民意的社會基礎、政治內涵與表現方式，而直接地馴服了大眾的信念，同時也在無形中促成政府權力的擴大與強化。現代民主政府在順應民意的同時，能夠主導甚至改變民意而俘虜大眾，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大眾的政治認知能力並沒有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而增加，反而是因為大眾傳播的普及，讓政府得以擁有更有效的統治工具。以美國社會為例，許多的調查研究都一致發現：現在選民大眾對政治的知識與了解，與1940年代的情形比較，並沒有太大的變化(Bennett, 1989;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1)。換句話說，隨著戰後社會的現代化變遷、

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以及大眾傳播電子媒體的普及發達，美國選民對政治的知識與認知能力，仍一如往昔《美國選民》一書(Campbell et al., 1960: 222-50)及 Philip E. Converse(1964)的〈大眾信念體系的本質〉文中所描述的發現一樣：選民普遍缺乏政治的知識，只有13%左右的選民勉強可以說具有意識型態，亦即：能作抽象政治思考、在政治態度與信念上具有一致與穩定的美國選民，只占極少數的比率。

一般說來，在古典的或規範性的民主理論中，典型的民主公民往往被認為應當具有豐富的政治知識、並且能作理性的政治選擇。然而，以經驗民主理論來看，尤其是以美國選民投票行爲研究為基礎的論據就明白地指出，民衆政治知識的不足與認知程度普遍低落的現象，實際上並未癱瘓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反而是民主制度所以具有彈性、民主政體所以穩定的主要原因之一(Berelson, 1952)。選民的政治認知程度不高，是否即表示選民的投票往往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行爲？或者是選民沒有政治上的思考與推理能力？然而根據越來越多的經驗研究所顯示，答案是否定的。當然，這不是新聞，更不是新的研究發現。早在1960年代，V. O. Key (1966: 7)在《負責的選民》一書的序言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本小書主要是一反過去的正統說法，旨在指出選民絕非傻瓜。」他接著又說：「當然，許多個別選民的行爲或許怪異些，然而以選民整體來說，在選項清楚又有訊息的情況下，都能符合我們的預期，作出理性與負責的行爲。」最近，Paul M. Sniderman等人(1991)所出版的《推理與選擇：政治心理學的探索》一書，則更進一步地指出：貫穿全書的主要研究主題之一，就在於證明一般的大眾，儘管在政治知識的不足情況下，依然能夠從個人的政治情感與有限的認知之中，導出一種所謂「啓發」(heuristics)或判斷的捷徑，來作理性的政治推理與選擇。

選民的選舉投票是一種政治行動，也是民主制度安排下的一項政治選擇。選民的投票行爲，正是探討與觀察一般大眾政治認知與推理最合適的對象。一般說來，投票行爲的研究發展，深受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而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有不同的理論途徑、取向與分析重點。早期「哥倫比亞

學派」的社會學途徑，主要側重於探討選民投票決定的社會團體與社經結構條件；後來「密西根學派」的社會心理學途徑，則強調選民政治態度居中影響的重要性；經濟分析的理性抉擇模型，則進一步從效益追求的角度，來分析選民理性的投票選擇。然而，無論採取何種理論途徑來分析投票行為，研究重點都不外於嘗試解釋選民「如何」作成選舉投票日所發生的投票行動。從政治認知與推理的角度而言，社會學研究途徑認為選民的政治認知與偏好，取決於選民的社會團體成員身份與社會經濟結構的特徵，而在選舉時投票支持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候選人。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固然也考慮選民社會經濟結構對政治認知所具的重要影響，但同時卻更強調政黨、候選人與選舉議題對選民政治認知與情感的決定性作用，並且藉著比較這三種投票取向的相對重要性，來立論說明選民如何作成最後的投票抉擇。理性抉擇模型的經濟分析，則不問選民的政治認知與偏好究竟受到何種因素所影響，而在於強調具有認知與偏好的選民，對不同政黨、候選人與議題的評估與比較結果是否符合選民最大「自我利益」的追求，來說明選民投票選擇的決定。

上述選民投票行為的各種研究途徑或分析的理論模型，可以說都直接或間接地嘗試從影響選民處理選舉相關訊息、以形成投票決定的種種因素中，尋找理論上的解釋變項。但遺憾的是，對於選民如何處理選舉訊息的政治認知過程本身，卻缺乏深一層的分析與探討，留下一段我們了解選民的政治思考與推理上的空白。的確，從訊息處理與政治認知過程來探討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乃是近年來受到認知心理學有關社會認知研究的影響，而逐漸興起的一種研究取向。本文即嘗試從社會認知與訊息處理的角度，以「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治練達」的概念，來說明選民對選舉相關訊息的政治認知情形，以及與投票行為間的關係。

二、政治的思維結構體

自1950年代以來，從「訊息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角度去了解人的認知活動，一直都是認知心理學所探討的主要領域；而探討人類互動

行爲以及影響判斷的情境因素與個別差異等，則是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研究主題。然而，自1970年代以後，這兩個學術領域的互相影響，而逐漸有結合社會心理學與認知心理學的所謂「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研究的興起。社會認知的研究，不外應用認知心理學上的概念與研究方法，來探討社會心理學所感興趣的研究主體；所以社會認知的研究，主要乃在於探討人類社會互動的認知機制，亦即嘗試了解「人們究竟如何獲得關於自我、他人與社會等知識」的問題(Holyoak and Gordon, 1984; Fiske and Taylor, 1984)。在社會認知的研究上，分析認知過程與訊息處理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思維結構體」(schema or schemata在心理學的中文翻譯上，也被譯成「基模」或「基體」)。「思維結構體」所指的，就是一個人對特定概念或一組刺激等一般性知識的認知結構。「思維結構體」概念所指涉的內涵，不僅包括概念的種種特徵，同時也涵蓋各種特徵之間的相互關係。因此，思維結構體所強調的認知活動，不外是一種由上而下的、以概念為基礎的、以理論為導向的認知過程；換句話說，思維結構體所強調的認知過程，即在於指出先前存在的知識結構，如何決定與引導新訊息的吸收、記憶與推論等處理過程。思維結構體也因認知對象內容的不同而可分為：人物的思維結構體(person schemata)、自我的思維結構體(self schemata)、角色的思維結構體(role schemata)與事件的思維結構體(event schemata)等。此外，思維結構體不但具有不容易改變的性質，同時應用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新訊息時，不僅吸收處理的訊息量較大，而且記憶也較集中、較準確，推論的速度也相對較快(Fiske and Linville, 1980; Fiske and Taylor, 1984: ch.6)。

以思維結構體的相關概念來分析民意與政治行爲，可追溯到在1920年代Walter Lippmann(1922)的民意研究。他指出研究民意的要訣不外是：「我們需假定每個人的作為，並非根據直接與特定的知識，而是基於個人自己塑造或別人所給予的圖像。」(ibid: 16)Lippmann認為民意的研究，乃在於探討這種民衆自己塑造或別人所給予的圖像，而這種圖像也就是他所謂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基本上，以社會認知的術語來看，「刻板印象」

就是一種關於「人」與「社會團體」等為對象的思維結構體。後來，Robert Axelrod(1973)也以專文介紹思維結構體的理論，如何應用到政治決策與政策科學方面的研究。自1980年以來，隨著社會認知研究的逐漸受到重視，Donald Kinder(1983)在檢討民意與政治行為研究的成果與文獻時，也呼籲未來的研究應重視思維結構體概念或理論的應用。近年來，包括民意與投票行為在內的所謂「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應用思維結構體概念與理論來作分析的學者，逐漸有愈來愈多的趨勢。¹

自1960年《美國選民》一書出版以後的投票行為研究，無論是採取社會心理學途徑或理性抉擇的分析模型，如上所述，都免不了應用社會心理學的「態度」概念暨相關的理論，來解釋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密西根學派社會心理學途徑的「漏斗因果」模型為例，不僅以態度的「學習理論」來說明政黨認同對投票行為的遠期影響作用，同時也以態度信念的「一致性理論」或「認知協調(或不協調)理論」，來分析選民對政黨、候選人及選舉議題的短期性相對影響作用。從理性抉擇的投票分析模型來看，無論是強調所謂「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或「展望性的」(prospective)投票考慮，基本上也可說是應用社會心理學的「預期－價值理論」或「歸因理論」，而以選民應用「效益追求」的角度對政黨、議題與候選人加以評估的態度結果為基礎，作為解釋選民理性投票選擇的論據(Lau and Sears, 1986a: 4-5)。

在傳統的習慣用法上，「態度」可視為包括個人關於態度對象(或情境)的一種情感、認知與行為等三種心理反應的傾向，同時「態度」也被認為是解釋行為的重要中介變項。上述以態度來解釋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傾向應用態度的一致性或認知(不)協調的相關理論，來解釋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因而也比較側重於分析影響行為的「動機」基礎。一個人先前既有知識的認知結構，毫無疑問地會決定他對新訊息的吸收與處理，而思維結構體所指的就是這種先前既有知識的認知結構，因此，以思維結構體的概念來解釋外顯行為，比較會注意到影響行為的認知結構與訊息處理的「非動機」因素(Conover and Feldman, 1991: 1365-66; Lazrus, 1984)。「態度」與「思維結

構體」同樣都是社會心理學的重要概念，但卻以不同的理論觀點，來了解個人的外顯行爲。因此，從「態度」轉到「思維結構體」概念的應用，對政治行爲與心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上所引述的，現在選民大眾對政治的知識與了解，與以前比較並沒有太大的變化；然而，若以態度一致性的標準來看，政治態度與信念具有一致性的選民，始終只是社會中的少數；這固然是一件事實，但並不表示選民的投票行爲是盲目的、或是未經思考的一種政治選擇行動。以思維結構體強調先前知識的認知結構與訊息處理的角度來看，選民或許對政治世界的了解有所差別，而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知識；同時，選民都會應用他們不同的既有知識，以有限的或比較豐富的政治思維結構體，去處理新的政治訊息與刺激，據以作有限理性的政治推理與選擇。因此，探討選民的政治思維結構體，不僅可以了解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推理，同時也有助於解釋選民投票行爲的作成。

思維結構體所指的，如上所述，乃是一個人對特定概念或一組刺激等一般性知識的認知結構。就一般大眾對政治世界的了解來看，基本上不外環繞著政黨、團體、政治角色、政治議題、階級及意識型態等對象或內容而來。因此，根據這些政治對象或概念所形成的知識與認知結構，就成為政治認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思維結構體。²由於思維結構體所強調的認知活動，是一種由上而下的、以概念為基礎的、以理論為導向的訊息處理；因此，思維結構體發展較完整或較豐富的民衆，在訊息處理的思考與推理過程中，也比較傾向於應用思維結構體來過濾、選擇、吸收與整合新的訊息，然後決定他的行爲反應。舉例來說，具有較豐富與較完整「黨派思維結構體」的選民，在充滿有關政黨、候選人與競選議題等選情訊息的選舉情境下，不僅會比較注意到政黨相關的報導與訊息、也能比較快速地回憶以往他對各個政黨的印象、立場與主張等知識(思維結構體的回憶與啓用)，同時並應用這些先前存在的知識結構，將相關的訊息加以選擇、吸收、整合到既有的知識結構中(思維結構體應用於政治思考與推理的訊息處理過程)，以形成對政黨作支持或不支持的投票行動(思維結構體所具有的預測能力)。對政黨、候選人、或

選舉議題等內容範疇為對象的各種政治思維結構體而言，不同的選民對同一類型的政治思維結構體，不僅有豐富與完整程度上的差別，同時不同選民在選舉相關訊息的處理上，所依賴的政治思維結構體也可能不一樣；有的選民比較依賴黨派思維結構體，有的則傾向於根據政治議題的思維結構體，也有從政治人格的思維結構體或團體思維結構體等等，來引導選情訊息的過濾、吸收與處理，而作政治的思考與推理，最後投下政黨、政見議題或候選人取向的一票。

在選情訊息充斥的選舉情境中，政治思維結構體愈豐富完整的選民，不僅能較快速地應用政治思維結構體來作政治思考，同時處理訊息的量也較大，推理也較快、較準確。從政治認知能力而言，選民應用政治思維結構體的兩個極端，就是所謂政治認知的「專家」(expert)與「生手」(novice)。政治認知的專家與生手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政治思維結構體的發展完整程度與應用程度；因此，他們對新政治訊息與刺激的處理上，也會具有下列的差別：一、在思維結構體啓用上，與政治認知的生手比較來看，政治認知的專具有結構較為完整豐富的政治思維結構體，因此比較會善用各種政治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新的政治訊息與刺激。二、在認知的能力上，政治認知的專家比較能夠處理具有衝突性的各種新訊息，也比較能吸收處理抽象性的訊息；相反地，政治認知的生手則比較會選擇同質性的訊息，訊息處理亦以具體性的訊息為主。三、在訊息的選擇上，政治認知的生手比較傾向於選擇吸收符合期望的訊息；然而，政治認知的專家則比較會同時注意到負面的與不符合期望的訊息；四、在認知與行為的反應上，政治認知的專家對不符合預期的新訊息，較可能激起強烈的情感及行為反應(Fiske and Kinder, 1981; Fiske, Kinder, and Larter, 1983; Lau and Erber, 1985)。

政治思維結構體的概念與理論，對研究大眾的政治心理，尤其是選民投票行為的心理上探討，提供一個分析認知與訊息處理的概念架構。對選民投票決定而言，政治思維結構體與政治的情感好惡，都是選民作政治推理與選擇行為的一種啓發或判斷捷徑(Sniderman et al., 1991)。所不同的在於，政

治情感所強調的比較是屬於環繞著政治對象或刺激的感受與情緒反應；而政治思維結構體所要強調的，則是面對政治對象或刺激而來的訊息，先前相關知識的認知結構如何引導訊息的選擇、吸收、與整合等訊息處理上的思考與推理過程。

三、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概念與測量

自1960年以來，「政黨認同」毫無疑問地是了解選民投票與大眾政治行為的一個核心概念。在美國的投票行為研究上，政黨認同不僅是選民投票行為的決定因素，也是選民賴以形成意見的主要依據之一，更是政黨與選民之間的心理橋樑(Campbell et al., 1960: Ch.6)。從政治認知的角度來看，在歐美政黨政治傳統深遠的民主社會中，選民傾向於應用既已存在的關於政黨的知識結構，來過濾、選擇、吸收與整合相關的政治訊息，以了解外在的政治世界，進而採取適當的反應行動；亦即歐美的選民在長遠來的政黨政治傳統下，經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已經獲得較豐富完整的「黨派思維結構體」，並以它來處理政治訊息與作政治上的思考與推理。密西根所發展的「政黨認同」概念的內涵與實際上的各種相關測量，毫無疑問地都比較強調選民對政黨的歸屬、忠誠等「情感的」要素；然而，在政治認知的探討上，黨派思維結構體所強調的內涵，卻是選民心中早已存在的、關於政黨(平時表現、政黨領導人物、議題主張與政治立場等所構成的)一般知識的認知結構。

對於了解歐美選民意見形成與投票行為，「政黨認同」既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也可見在歐美政黨政治中，選民或多或少都具有「政黨」或「黨派」的思維結構體。然而，在面臨民主轉型與競爭性政黨政治萌芽的臺灣社會，一般的選民是否具有發展較為完整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換句話說，臺灣的選民在充滿黨派之爭與各種政治性訊息爆炸的選舉情境中，是否傾向於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來吸收與處理選舉相關的訊息、以作成最後的投票決定？這問題可以從兩個相關角度來觀察：一、是關於臺灣政治環境的改變，尤其是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出現，是否有助於一般選民逐漸形成政黨的

認知結構，亦即黨派思維結構體是否能看成是當前選民在處理政治相關訊息、了解外在政治世界的一種政治思考與推理上的「啓發」或判斷捷徑；二、是如何測量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的問題。

臺灣政黨政治的雛形，雖然是戒嚴解除黨禁開放以來的新發展，但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政黨已經成爲民衆政治思考與了解政治事務的參考團體。首先，也許是長期來「黨國不分」的威權統治結果之一，以往民衆對所謂「政治的」事務往往與「國民黨的」聯想在一起；雖然在後解嚴時期，這種以政治事務等同於國民黨事務的認知或許已經改變，但政黨名稱（尤其是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黨名）仍然是一般民衆在政治認知聯想上，最常出現與使用的語言。其次，近年來關於國家主權的定位、統獨之爭的議題，不僅平時出現在大眾傳播媒體的頻率很高，更是各次選舉競爭的熱門議題，朝野兩大政黨在這些政治議題上，也都具有強烈對立的主張與立場；因此，隨著逐漸浮顯的各種重大政治議題，選民對這些議題的認知，也往往與政黨的立場關聯起來了解。第三、朝野兩大政黨不僅在選舉競爭中，卯足全力往下紮根以動員選民大眾的支持，同時在中央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等問政舞台上，兩黨亦常有激烈衝突的場面；選民大眾在黨爭相關訊息充斥的政治環境下，不免形成黨派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政治相關訊息、以了解政治世界。假定我們有相當充分的理由相信：臺灣的選民在解嚴後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隨著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出現，已經發展出某種程度的黨派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政治相關訊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測量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

在政治認知的研究上，測量政治思維結構體的方法，除了採用認知心理學所慣用的實驗方法，以觀察思維結構體一致性訊息的反應時間與認知的正確比率，來推斷思維結構體的存在外，也有用「Q方法」(Q methodology or Q sort)來直接測量，以推定政治思維結構體的存在與否；³ 另一種屬於比較間接的測量方法，則是從開放式問卷的調查資料中，以「自由回憶的線索」來建構觀察政治思維結構體的完整程度(Lau and Sears, 1986b: 360)。本文所分析的資料，是陳德禹與胡佛共同主持，游盈隆、徐火炎、朱雲漢、洪永

泰、吳乃德與陳明通等協同主持的「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爲：民國八十一年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研究計劃，由行政院國科會補助(計劃編號 NSC82-0301-H002-103)而收集的全省性抽樣調查的資料。因此，我們也根據受訪者對有關政黨的開放式問卷題目的回答，間接地來觀察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是否存在。在本文分析的選舉調查資料中，有四道問題是關於政黨表現的開放式問題，其中兩道問題是問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特別欣賞的自由回憶，其他兩道問題則是問選民對這兩大政黨特別反感的自由回憶。這四道測量問題分別是：

- (1) 請問國民黨近年來的表現，有沒有什麼特別讓您欣賞的地方？若有，(續問)請問是什麼？
- (2) 請問國民黨近年來的表現，有沒有什麼特別讓您反感的的地方？若有，(續問)請問是什麼？
- (3) 請問民進黨近年來的表現，有沒有什麼特別讓您欣賞的地方？若有，(續問)請問是什麼？
- (4) 請問民進黨近年來的表現，有沒有什麼特別讓您反感的的地方？若有，(續問)請問是什麼？

我們透過這四道開放式問題中「自由回憶的線索」，來建構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程度的量表。一方面，選民無論是以正面(特別欣賞)或負面(特別反感)的線索內容來回答，也不論選民回答所針對的政黨對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只要他能例舉特別具有印象的事例內容，我們則據以推定選民傾向於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來作選舉相關訊息的處理；另一方面，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發展完整程度或豐富性，也從選民是否在這四道問題上作回答的頻率中，來加以觀察；換句話說，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是從0到4的五種可能程度來量化計分。

四、政治練達的概念與測量

在政治認知的研究上，除了上述包括政黨、政治角色、議題、階級及

意識型態等政治的思維結構體外，另一個常被用來說明一般民衆政治思考與推理的主要變項，就是所謂的「政治練達」(political sophistication)。自Campbell等人(1960)的《美國選民》一書出版以來，政治練達就成爲解釋選民的政治認知如何影響投票行爲的一個核心概念，尤其後來Converse(1964)的〈大眾信念體系的本質〉一文，更成爲這方面研究的經典著作。⁴ 他們從選民對政黨與候選人作評估的開放性問題回答內容中，以選民所使用政治語言的抽象程度、及選民提到政治對象所指涉的範圍等，來指選民政治思考上的「概念化水平」(levels of conceptualization)，並將選民順序分成四類：意識型態與接近意識型態、團體利益、時間的本質與無具體內容等四類。Campbell與Converse等人認爲，概念化水平不外在於顯示：選民能否了解或應用意識型態抽象概念的一種政治思考的習慣或政治關懷。因此，概念化水平愈高的選民，不僅指愈能作意識型態的政治思考，同時政治信念體系也愈具有一致性與功能上的相互依賴的特性。換句話說，他們以政治思考的「概念化」來指選民的「政治練達」，以強調選民對政治議題與事務所持態度信念之間的一致性，而這也正是意識型態的一種特色。

在政治認知的研究上，政治練達也是用來說明政治認知的「專家」與「生手」的主要概念。毫無疑問地，政治「概念化」的能力是政治練達的一種重要特徵，但作爲區分政治認知專家與生手的差別，政治練達的內涵不應只限於指政治信念與態度是否有一致性上的「概念化水平」而已，同時也應包含選民對其他的政治興趣與相關知識(Fiske and Kinder, 1981; Fiske, Kinder, and Larter, 1983)。因此，Lau and Erber(1985)在探討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時，就採取認知爲基礎的一種測量方法。他們根據密西根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全國大選調查資料，以選民對候選人的熟悉程度、對競選議題的了解程度、對民意調查的知識、在競選過程中支持候選人的活動、收視傳播媒體有關競選訊息的程度、一般的政治興趣、以及是否關心選舉結果等七種指標，來建立「政治練達」的綜合測量。

本文對選民「政治練達」水平的測量，基本上也採取類似Lau and Erber

的方法，以選民對兩黨政治立場與主張的知識、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相關活動中獲知候選人的媒體使用程度，以及對選舉結果的關切與選舉期間的參與等指標來測量。在本文分析的調查資料中，這些測量選民政治練達水平的具體指標為：(1)由於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臺灣前途」、「一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統一或台灣獨立建國」、以及「以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或臺灣的名稱加入聯合國」等議題，具有客觀明確的對立主張與立場，因此，以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這些議題上的正確認知來加以測量；(2)以選民是否從政府報導的看板、選舉公告與選舉公報、從大眾傳播媒體的報紙、電視、電台與書刊雜誌等、以及從候選人競選活動的傳單、錄影帶、刊登的廣告、政見發表會等媒體活動中認知候選人等，來測量選民應用媒體訊息的程度；(3)以選民對選舉結果的關心程度；以及(4)以選民是否在選舉過程中閱讀選舉公報、候選人傳單、聽取候選人政見發表會、觀看電視上候選人或政黨的競選廣告等，來測量選舉參與的程度。本文所謂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即建立在上述四類測量指標的基礎上。

五、資料的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文旨在於嘗試從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及政治練達水平，來觀察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政黨認同、政黨印象、政黨政治價值等，黨派心理特徵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說明這些黨派心理特徵，如何與選民的投票取向與黨派投票行爲關聯起來。文中關於政黨偏好、政黨支持、政黨印象與政黨政治價值取向等，這些重要概念的測量與操作化的詳細量表，請參見附錄。

1. 黨派思維結構體、政黨認同與政黨印象

首先，我們從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特別欣賞或反感的自由回憶中，來觀察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我們以受訪者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具有正(欣賞)反(反感)面特別感受的回憶情形，來間接地觀察選民在選舉過程中對相關訊息的處理，是否傾向於啟動與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我們的重點在於觀察選民是否存在或傾向於啓用黨派認知結構體，因此，我們只以

選民對政黨特別感受的作答頻率，來推定選民使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情形，而不論選民針對的是那個政黨、也不論特別感受的正負面性質。在充滿黨派性選舉訊息競選情境中，只要選民對政黨具有特別感受的事項愈多，無論是正面抑或反面的感受，我們都假定選民愈可能會以這種既存在的關於政黨知識的認知結構，來吸收、選擇與整合黨派性的選舉訊息。從表一的資料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受訪民衆沒有啓動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比率頗高，占全體受訪樣本的31%左右，也大約占去投票受訪者的24%左右。從另一個極端來看，受訪民衆對兩大政黨均具有特別感受(回答四題)的比率，不到投票選民的18%，而大部分的投票受訪者，可說多少皆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政治訊息，差別只在於豐富或程度的問題。

其次，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的程度，以受訪樣本的曾否投票來看，則具有顯著的差別。如表一所示，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選民對當前的兩大黨，無所謂特別欣賞或反感的事項內容可言，這類民衆幾達未投票受訪選民的一大半。換句話說，將近一半的未投票選民，尙未具有豐富的或發展成形的黨派思維結構體；然而，具有某種程度的黨派思維結構體並啓用它的(有一道題至四道題自由回憶線索可尋的)選民，無論他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如何，在第二屆立委選舉時沒去投票的比率，如表一所示，只有大概11%至14%左右。受訪者之中，去投票與沒去投票的選民，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與豐富程度上，如表一所顯示，的確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別。

「政黨認同」基本上是指民衆對一個政黨具有歸屬感或偏好的情感或心理上認同，同時也被認爲是民衆形成政治意見的主要根據；因此，在歐美有關政治認知與媒體訊息處理的研究上，政黨認同也被視爲一種政治的思維結構體。⁵但這兩者所強調的重點不同，政黨認同比較強調選民對政黨的「情感」要素，而黨派思維結構體所強調的，則比較側重於選民對政黨的「認知」要素。無論以密西根學派所用的自我標定方法來加以測量，或以本文所用的感情偏好與政治立場的支持等兩道問題綜合來測量(測量題目見附錄)，我們皆能預期選民的政黨認同與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之間，必然都會

表一 選民對政黨具有特別感受事項的回答比率

黨派思維結構體 應用程度	全體樣本		投票選民		未投票選民	
	N	%	N	%	N	%
低：沒有回答	437	31.3	240	24.2	197	48.3
回答一題	207	14.8	149	15.1	58	14.2
回答兩題	269	19.2	213	21.5	56	13.7
回答三題	268	19.2	216	21.8	52	12.7
高：回答四題	217	15.5	172	17.4	45	11.0
合計	1398	100.0	990	100.0	408	100.0

$\chi^2 = 82.57$ (df=4)
Gamma = .345 (p<.001)

具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政黨認同愈強烈的選民，也愈傾向於依賴與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政治訊息，或作政治上思考與推理的依據。從(增)G的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1) (L)論是全體的受訪樣本或投票選民的樣本，對政黨(國民黨或民進黨)具有較強烈偏好、或對政黨(國民黨或民進黨)政治立場具有較強烈支持的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也顯著較高。(2) 沒有政黨偏好或不支持任何政黨政治立場的選民，對政黨具有特別感受事項的頻率也相對較少，亦即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較低。(3) 選民對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與政黨偏好、政黨支持的強度之間，具有統計上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亦即：選民具有較強烈的政黨認同感(本文以政黨偏好與政黨立場支持來測量)，使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也顯著較高。

從選民對政黨具有特別感受事項的頻率，固然可以間接推定他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然而，我們也可以從選民處理有關政黨的訊息中，尤其是應用在對政黨印象的言詞描述上，進一步來分析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我們預期黨派思維結構體發展程度較完整的選民，對政黨也會具

表二 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黨偏好及立場支持

	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	
	全體樣本	投票選民
(一) 政黨感情偏好：	平均數 (人數)	平均數 (人數)
強烈傾向國民黨	2.356 (118)	2.455 (110)
中度傾向國民黨	2.106 (275)	2.171 (222)
輕微傾向國民黨	2.067 (105)	2.000 (83)
不偏那一黨或其他	1.351 (733)	1.604 (444)
輕微傾向民進黨	1.815 (54)	1.949 (39)
中度傾向民進黨	2.307 (81)	2.277 (65)
強烈傾向民進黨	2.125 (32)	2.111 (27)
Eta 係數	.28***	.22***
(二) 政黨立場支持：	平均數 (人數)	平均數 (人數)
非常接近國民黨	2.417 (84)	2.432 (81)
接近國民黨	2.182 (220)	2.197 (193)
有些接近國民黨	2.201 (154)	2.202 (119)
不接近那一黨或其他	1.285 (744)	1.546 (447)
有些接近民進黨	2.181 (83)	2.200 (60)
接近民進黨	2.303 (89)	2.275 (69)
非常接近民進黨	2.208 (24)	2.286 (21)
	1.729 (1398)	1.930 (990)
Eta 係數	.33***	.25***

*** p<.001

有較深刻的定見或認知，亦即對政黨會具有比較明確的「刻板印象」。我們從四種常在選舉競爭時被對立政黨引用為攻訐對方的政治議題，如：人權保障、貪污與腐化、特權、利益代表等問題，請受訪者就這些議題說出他們所知道的國民黨或民進黨，究竟是怎樣的政黨(測量題目見附錄)；然後以這些議題的正反面陳述，來登錄選民對兩大政黨的印象。首先，從表三的分析結果所顯示，無論以全體受訪樣本或投票的選民樣本而言，對國民黨與民進黨

具有明確印象(無論是正面的或負面的)言詞表示的民衆，比較回答模稜兩可政黨印象(即回答「兩者皆可」或「不知道」)的受訪者而言，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上顯著為高。其次，無論從人權保障、貪污與腐化、特權或利益代表等議題來看，具有明確刻板印象者與只有模稜兩可或曖昧印象者來比較，在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的程度上，皆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亦即：黨派思維結構體發展較完整或較豐富的選民，同時也對政黨具有較明確的正面或負面印象。這發現也說明：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較高的選民，同時也是比較屬於對政黨存有深刻定見的、或對政黨存在具有較豐富認知結構的選民。

2. 政治練達水平與政治認知

本文以下的分析對象，以曾經在第二屆立委選舉時參加投票的受訪者為主。這一方面是投票選民的投票取向與黨派投票抉擇，乃是本文的主要分析重點；另一方面是由於本文以下所討論的概念，實際上只針對曾經參加投票的受訪者來加以測量。政治練達水平的測量就只針對受訪者中的投票選民，並以下列四種指標來操作化：(1)從「臺灣前途」、「一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統一或臺灣獨立建國」、以及「以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或臺灣的名稱加入聯合國」等議題，來測量選民對當前兩大政黨的正確認知，亦即選民是否了解客觀上國民黨與民進黨在這些爭議的議題上，各有明確而對立的政治主張與立場；(2)從選民以政府報導的看板、選舉公告與選舉公報、大眾傳播媒體的報紙、電視、電台與書刊雜誌、以及從候選人競選活動的傳單、錄影帶、刊登的廣告、政見發表會等媒體活動等管道認知候選人，來測量選民應用媒體訊息的程度；(3)選民對選舉結果的關心程度；(4)從選民是否在選舉過程中閱讀選舉公報、候選人傳單、聽取候選人政見發表會、觀看電視上候選人或政黨的競選廣告等，來測量選民選舉參與的程度。因此，政治練達水平是建立在選民對政黨議題立場的正確認知、媒體訊息的使用、選舉結果的關懷、以及選舉活動的參與等基礎上。從表四中的因素分析結果所顯示，這四種指標的五種測量分數，均具有高度的正相關關係，可以抽繹出一個單一

表三 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黨印象表示

	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 (0-4 分)			
	全體受訪樣本		投票選民	
	國民黨 平均 (N)	民進黨 平均 (N)	國民黨 平均 (N)	民進黨 平均 (N)
在人權保障上：				
重視人權	2.008(119)	2.269(119)	2.033(90)	2.327(101)
兩者都有/其他	1.406(753)	1.348(756)	1.646(472)	1.565(485)
忽視人權	2.127(526)	2.157(523)	2.222(428)	2.270(404)
Eta 係數	.24***	.28***	.20***	.25***
在貪污與腐化上：				
縱容貪污腐化	2.220(382)	2.000(50)	2.296(284)	2.000(34)
兩者都有/其他	1.460(820)	1.246(708)	1.722(540)	1.491(458)
打擊貪污腐化	1.898(196)	2.242(640)	1.982(166)	2.329(498)
Eta 係數	.23***	.34***	.18***	.29***
在特權的問題上：				
打擊特權	2.271(340)	2.278(133)	2.353(261)	2.439(107)
兩者都有/其他	1.477(850)	1.360(801)	1.726(558)	1.578(517)
玩弄特權	1.875(208)	2.209(464)	1.953(171)	2.279(366)
Eta 係數	.23***	.29***	.19***	.26***
在利益代表上：				
代表有權有勢者	2.205(414)	2.118(51)	2.268(313)	2.159(44)
兩者都有/其他	1.369(696)	1.336(718)	1.616(440)	1.550(455)
代表一般民衆	1.913(288)	2.146(629)	2.068(237)	2.263(491)
Eta 係數	.26***	.28***	.20***	.25***

*** $p < .001$

面向的共同因素；這因素分析的結果也說明這五種測量分數所測得的共通內涵，可以視為是本文所謂的「政治練達」。

表四 政治練達的因素分析

測量指標：	政治練達
對國民黨立場的知識	.84969
對民進黨立場的知識	.86282
媒體訊息的使用頻率	.59627
選舉結果的關懷程度	.59289
選舉活動的參與程度	.70255
固有值	2.66706
解釋總變易量百分比	53.3

樣本數=990.

本文從政治認知的角度來操作化「政治練達」，而以選民對政黨的客觀認知、媒體訊息的使用、選舉結果的關懷與選舉活動的參與等指標來測量。假定政治練達要能有效地反應出選民在政治認知上「質的」(qualitative)特徵，則政治練達水平愈高的選民，同時也應該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上，顯示出比較高的傾向，這樣才符合作為區別政治認知的「專家」與「生手」的依據。從表五的相關分析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選民對政黨的知識、媒體訊息使用、選舉結果關懷與選舉活動的參與程度等，以及這些測量指標所綜合構成的政治練達水平，與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這項發現也說明從不同的角度(即從政治認知出發)來測量政治練達水平，同樣可以像Campbell等人(1960)及Converse(1964)用政治概念化水平，來顯示選民的政治抽象思考能力。然而，以政治概念化水平出發，基本上假定了選民以意識型態的角度來作政治思考與推理的程度，或以政治態度與信念的一致性與功能上具有相互依賴的性質，來看選民的政治思考與推理能

表五 政治練達水平與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的相關分析

	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 (相關係數)
對國民黨立場的知識	.4109 ***
對民進黨立場的知識	.4532 ***
媒體訊息的使用頻率	.2112 ***
選舉結果的關懷程度	.3408 ***
選舉活動的參與程度	.2692 ***
政治練達水平(因素分數)	.4714 ***

樣本數=990. *** $p < .001$ (單尾檢定)

力。這樣的觀點容易把選民「看呆了」，因為無論在那一個社會，真正能具有意識型態或政治態度與信念具有一致性的選民，畢竟只是少數的比率。這種所謂從整體資料的分配性質，來推估或論斷選民政治練達水平的個體面特性，被後來的許多研究批評為極不恰當(Barton and Parsons, 1977; Wyckoff, 1980; Hagner and Pierce, 1983)。從政治認知的角度，來探討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及政治的思維結構體的應用情形(本文的旨趣只限於分析「黨派思維結構體」而已)，並不假定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較少、或政治練達水平較低的政治認知「生手」，在政治思考或推理上會傾向於不理性。早在1966年時Key(1966)強調「選民絕非傻瓜」，就企圖扭轉這種關於選民的不當印象；後來，Sniderman等人(1991)的研究，也在於說明就算選民的政治認知較少，應用政治思維結構體的程度較低，或政治練達水平較低，選民仍然會以政治上的好惡情感，配合有限的政治認知以作理性的政治思考與推理。因此，以政治認知的角度來看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與黨派思維結構體的使用情形，主要在於觀察選民究竟傾向於用政治上的好惡情感，或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來處理政治上訊息，來作理性思考與推理的依據。

3. 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治性訊息的處理

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在於說明選民可能回憶與啟動先前關於

政黨的知識結構，用於吸收處理政治性訊息的情形。影響選民政治認知能力的因素固然不少，但本文的分析重點則從選民的性別、年齡、省籍與教育程度等變項中，來觀察為何不同的選民在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上會具有差別。從表六的分析結果來看，首先，教育程度是決定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的最主要因素；其次，選民性別的不同，而在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也具有顯著的差別存在；然而，選民在年齡與省籍的不同，對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上，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詳細來說，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可能平時就比較能認知與了解到政黨的各種措施與表現，因而具有正反面的特別感受也較強烈；同時，男性的選民比女性選民，較可能注意到政黨平時的所作所為，而持有較多正反面的特別感受。這點發現也同時顯示，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教育程度比較高的選民與男性的選民，比較會注意到政黨平時的作為與表現，並以政黨作為政治滿意或不滿意的批評與歸咎對象。因此，教育程度較高的與男性的選民，可能具有發展較完整豐富的黨派思維結構體，並且傾向於應用它來處理相關的政治訊息，以作政治上思考與推理的根據。

表六 影響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的因素（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 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	
解釋變項：	(β)
性別（男）	.186***
年齡（大）	-.036
省籍（本）	-.025
教育（高）	.325***
校正後解釋總變易量百分比	.170
有效樣本數	984

註：性別與省籍等變項以虛擬變數來處理。*** $p < .001$

黨派思維結構體所指的，無非是一般民衆對政黨既已存在知識的認知結構。我們以選民對兩大政黨是否具有特別正反面感受的自由回憶線索，來推定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而且也認為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情形，會有效地反應出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是否發展完整或豐富的程度。假定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概念具有政治分析上的用處，而有助於我們了解選民的政治認知與政治推理過程，則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或豐富程度，必能同時也表現在政治性與黨派性訊息的吸收、處理與整合的思考與推理結果上。換句話說，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會表現在我們給選民政治性或黨派訊息刺激的處理反應上。我們作選民投票行為資料收集的問卷調查，不外在於給受訪選民一些政治性(包括有關黨派與選舉)的訊息或刺激，來幫助選民回憶選舉過程中的種種現實狀況，從而了解選民的選舉投票行為。以政治認知的觀點而言，問卷資料收集中測量問題所問的內容，即在於提供選民一種比較有組織的政治相關訊息，以了解他們的黨派心理特徵與投票行為。因此，我們在施測選民有關政黨政治的價值信念、對政黨的偏好傾向與立場支持(合併為「政黨認同」的測量)、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兩大黨的印象等，即在於了解選民面對這些黨派為對象內容的政治訊息，所反應出來的黨派心理特徵究竟為何。假定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的豐富程度，會影響選民對這些問題內容所帶來政治性訊息的處理，則我們可以預期選民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的程度，必然會對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傾向、政黨認同、政黨印象等黨派心理特徵，發生顯著的影響作用。

首先，從表七迴歸分析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因性別、省籍、教育程度的差異，及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等不同，而有統計上的顯著差別：男性的、本省籍的、教育程度較高的以及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程度較高的選民，相對地具有較強烈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換句話說，具有這些特徵的選民，不僅較能接受反對黨有助於政治進步、較不會認為參加反對黨就等於不愛國，同時也較同意政黨應當輪流執政、較相信政黨競爭無礙於政治安定等，因而具有較強烈的政黨政治價值與信念。

表七 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與黨派訊息的處理（迴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項：	依變項：政黨政治	政黨認同	國民黨	民進黨	兩黨印象	政治練達
	價值取向	(民進黨)	印象	印象	差異	水平
	(β)	(β)	(β)	(β)	(β)	(β)
性別(男)	.109***	.014	.037	.003	-.022	.078**
年齡(大)	.055	-.143***	.057	-.045	-.065*	-.088**
省籍(本)	.125***	.250***	-.015	.199***	.136***	-.084**
教育(高)	.248***	-.219***	-.013	.030	.027	.346***
黨派思維結構體						
應用程度(高)	.151***	-.106***	-.103***	.205***	.196***	.251***
政黨政治價						
值取向(高)	---	.348***	-.060*	.160***	.140***	.096**
政黨認同(民)	---	---	-.522***	.277***	.509***	-.069*
兩黨印象差異(民)	---	---	---	---	---	.098**
校正後解釋總						
變易量百分比	.117	.234	.308	.254	.425	.409
有效樣本數(N)	984	984	984	984	984	984

* $p < .05$ ** $p < .01$ *** $p < .001$

說明：性別與省籍等變項以虛擬變數來處理。

其次，以影響政黨認同的因素來看，表七的分析結果顯示，選民的年齡、省籍、教育程度、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與政黨政治價值信念等因素，對於政黨認同均具有顯著的決定作用。我們以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兩黨的感情偏好與政治主張上的接近程度，來綜合測量選民的政黨認同，以分數愈高表示愈偏向於民進黨的認同，反之分數愈低愈傾向於認同國民黨。表七所顯示的分析結果，不外指出年紀愈輕的、本省籍的選民、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較低的、以及政黨政治價值傾向較高的選民，比較傾向於認同民進黨。從上面表二，我們也發現不偏向那一政黨、或不支持任何政黨立場的選民占絕大多數，這也說明具有上述特徵的選民，

傾向於「不認同國民黨」。表二也同時顯示，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的程度與「黨派性強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的關係，但與具有方向性的政黨認同，卻呈現負的影響關係。這也進一步說明黨派思維結構體較豐富且應用程度較多的選民之中，以國民黨認同者為多。雖然，如表六所顯示的，教育程度是決定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的最主要因素；但就選民的政黨認同而言，黨派思維結構體的豐富與應用程度，仍然具有顯著的淨影響作用。

第三、從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關於「人權保障」、「貪污與腐化問題」、「特權問題」與「利益代表」等議題立場的刻板印象來看。首先，表七的分析結果顯示：選民對國民黨的印象好壞，取決於選民的政黨認同、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黨政治的價值取向等黨派心理特徵的變項，並不因為選民的性別、年紀、省籍或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顯著的差別。其次，選民的政黨認同、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黨政治的價值取向等黨派心理特徵的變項，不但顯著地決定選民對民進黨印象的好壞，同時選民對民進黨的印象，也因省籍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省籍不同的選民對國民黨的印象，並沒有顯著的差別；但對民進黨的印象來說，省籍則是具有顯著作用的決定因素，亦即：本省籍的選民比大陸省籍的選民，對民進黨的印象較好。

其中，值得特別指出的發現是：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愈高的選民，如上所述，比較偏向於國民黨，但對國民黨在上述的議題處理上，卻反而具有顯著較差的印象，而對民進黨卻顯著地具有較正面的印象。這項發現一方面也說明：黨派思維結構體較完整豐富的選民，比較能處理相互衝突的訊息，能作較客觀的評價。另一方面也指出：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程度較高的選民，雖然較支持國民黨的政治立場、也在感情上較偏好國民黨，但對國民黨在上述人權保障、貪污腐化、特權與利益代表等議題上的種種處理表現，表示較高度的不滿而具較負面的印象。這類選民雖對民進黨的認同感較低，但對民進黨在這方面的表現，卻表示肯定而給予較正面的印象。政黨政治價值取向與國民黨的印象及民進黨的印象之間的關係，如同政黨認同的影響關係一樣，雖然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是決定選民政黨認同的因素，但在影響選民對

政黨的印象上，仍具有獨立存在的直接影響效果。就教育程度而言，對政黨政治價值取向與黨派思維結構體，皆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但在選民對兩黨的印象上，卻不具顯著的影響關係。這項研究發現在於指出，教育程度固然是表示認知能力的重要變項，但在涉及黨派性訊息的處理上，教育程度的作用就被其他具有政治性質的影響因素所取代；換句話說，選民對政黨印象的訊息，往往是透過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來吸收、處理及推理。因此，只從代表選民一般認知能力的教育程度變項來看，而不考慮政黨認同、政黨政治的價值取向與黨派思維結構體時，並不能了解他們如何處理政黨印象相關的「黨派性」訊息。

我們以選民對民進黨的印象分數，減去他們對國民黨的印象分數，來表示選民對兩黨的印象差距。在表七的分析結果中，決定選民對國民黨與民進黨印象好壞高低的因素，同樣也在兩黨印象的差異上表現出顯著影響作用。此外，原來不具顯著作用的年齡變項，則在兩黨的印象差異上，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這研究發現在於說明：以選民對兩黨所具有的正面或負面印象而言，年紀較輕的選民比年紀大的選民，較傾向於作明確與趨於兩極端的表示。假定分別從兩黨的印象來看，則不能彰顯出年紀差別的影響效果，但從兩黨的印象差距一併來比較兩黨的印象時，卻能凸顯出年紀對政黨印象差距的影響作用。

最後，我們來看影響選民政治練達水平的因素。上述指出，政治練達水平是綜合選民對政黨政治立場與主張的認知、媒體訊息的使用程度、選舉結果的關懷與選舉活動的參與等指標，以測量選民在政治認知上「質的」特徵。表七的分析結果顯示，我們所考慮的各種個人特徵、社會人口學上的屬性、以及與黨派訊息處理相關的心理特徵等變項，對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均具有或大或小的直接且顯著影響作用。其中，以教育程度的影響效果為最大，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居次。首先，男性的、年紀輕的、大陸省籍的選民、與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政治練達水平較高；其次，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程度較高的、與政黨政治價值取向較強烈的選民，政治練達水平也較

高；政黨認同偏向於民進黨的選民，政治練達水平卻較低；對民進黨印象比對國民黨印象要好的選民，即兩黨印象差距較大的選民，他的政治練達水平也顯著較高。

4. 影響投票取向與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

從上述對於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兩黨印象及差異、與政治練達水平等黨派心理特徵的分析之中，我們發現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應用程度，的確對這些相關的黨派心理特徵或價值取向，具有直接而顯著的影響作用。以下，我們進一步探討上述各種變項，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與投票取向，究竟具有怎樣的影響關係？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主要是根據選民支持國民黨或民進黨候選人的實際投票（投票給其他政黨或無黨籍的選民類別比率很低，同時非本文的分析重點，故而略去），乃是一個兩分類別性質的依變項，因而以「洛基迴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來進行分析。從表八的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選民的省籍差異、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兩黨印象差異等，乃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主要決定因素。首先，本省籍選民投票支持民進黨的可能性，幾乎是外省籍選民的五倍半；其次，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測量單位的增加變化，對民進黨投票支持可能性也增加一點三倍；第三，傾向於認同民進黨的政黨認同測量分數增加一個單位，投民進黨候選人的機會也增加將近四倍之多；最後，選民對民進黨的印象分數比對國民黨的印象分數高一個測量單位，投票支持民進黨的可能機率，也顯著地增加一倍半。省籍、政黨認同、政黨政治價值取向與政黨印象差距等變項，可以很有效地解釋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差異；然而，這項分析結果和以往的研究發現(徐火炎，1993)，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選民的投票取向所指的是，選民最後的投票決定究竟是基於那一種原因或考慮。在歐美的投票行為研究上，大家所熟知的是政黨取向、候選人取向與政見議題取向等三種投票取向。但在臺灣的選舉情境中，除了這三種投票取向外，我們還需考慮「人際及社會網絡的投票取向」(關於投票取向的測量與操作化歸類方法，請見附錄說明)。因此，我們以這四種投票取向作為依

表八 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洛基迴歸分析

依變項：		黨派投票抉擇 (投民進黨)	
		(N=205)	
解釋變項：		(B)	Exp(B)
性別(男)		-.088	.915
年齡(大)		-.004	.996
省籍(本)		1.696	5.454**
教育(高)		-.164	.849
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高)		.046	1.047
政黨政治價值取向(高)		.301	1.351*
政黨認同(民)		1.362	3.903***
兩黨印象差異(民)		.425	1.529***
政治練達水平(高)		.136	1.145
常數項		-1.671	-----
Log Likelihood = -318.717			
Number of obs = 936			
$\chi^2(9)$ = 472.42			
Prob > χ^2 = 0.0000			
Pseudo R ² = 0.426			

* p<.05 ** p<.01 *** p<.001

說明：以投國民黨票(N=731)為參考比較的類別
性別與省籍等變項以虛擬變數來處理。

Exp(B): Odds ratio

變項，同樣以上述所提到的各種解釋變項，來進行「多重的洛基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表九所顯示的，是以候選人取向投票的類別作為比較基礎的分析結果(亦即在表九中，以候選人取向投票的機率比，odds ratio為1)。首先，我們發現以人際及社會關係網絡作投票考慮的選民，相對於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者而言，政治練達水平顯著地比較低，但對兩黨的印象差距卻顯著比較大。其次，與候選人取向投票的選民比較來看，選民會

表九 選民投票取向的多重洛基迴歸分析

依變項：	人際及社會 網絡投票 (N=250)		政黨取向 投票 (N=100)		政見議題 投票 (N=123)	
	(B)	Exp(B)	(B)	Exp(B)	(B)	Exp(B)
解釋變項：						
性別 (男)	.009	1.009	.639	1.894**	.171	1.187
年齡 (大)	-.001	.999	.007	1.007	-.003	.997
省籍 (本)	.482	1.620	.362	1.436	.043	1.043
教育 (高)	.075	1.078	.023	1.024	.026	1.026
黨派思維結構體						
應用程度 (高)	-.005	.995	-.056	.946	.094	1.099
政黨政治價值取向 (高)	-.051	.950	-.017	.984	.006	1.006
政黨認同 (民)	-.080	.923	-.313	.731**	.224	1.251*
兩黨印象差異 (民)	.186	1.205**	.070	1.072	.113	1.120
政治練達水平 (高)	-.731	.481**	.291	1.338*	.426	1.531**
常數項	-1.411*	---	-2.740***	---	-1.691*	---
Log Likelihood = -1018.805						
Number of obs = 907						
$\chi^2(27)$ = 179.02						
Prob > χ^2 = 0.0000						
Pseudo R ² = 0.081						

* p<.05 ** p<.01

說明：以候選人取向投票(N=434)為參考比較的類別
性別與省籍等變項以虛擬變數來處理。

Exp(B): Odds ratio

以政黨取向投票的，以男性的機率較大，同時對民進黨的認同程度卻顯著比較低，但政治練達水平卻顯著比較高。第三，以政見議題取向作最後投票考慮的選民，無論是認同民進黨的程度或政治練達水平，都比候選人取向的選民顯著為高。總而言之，會以人際及社會網絡作投票考慮的選民，對民進黨的印象比對國民黨的印象顯著較佳，但他們的政治練達水平卻顯著地較低；會以政黨取向來作投票決定的選民，以男性的、比較認同國民黨的（愈不認同民進黨的）及政治練達水平較高的選民，可能性較高；然而，比較認同民進黨、政治練達水平顯著比較高的選民，則以政見議題的考慮來投票的機會較大。

從上述關於選民投票取向與黨派投票抉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1) 影響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因素，除了省籍外，最主要的是包括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兩黨的印象差距等黨派的心理特徵；(2) 決定選民投票考慮取捨的因素，除了性別及黨派心理特徵的政黨認同與兩黨印象差距外，最主要的影響作用，則是政治認知因素的「政治練達水平」。無論就黨派性的心理特徵、或政治認知因素的政治練達水平，都與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具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是否豐富，不但直接地影響到他們對政黨政治的價值信念、政黨認同、政黨印象等黨派的心理特徵，同時也直接地決定了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透過黨派心理特徵與政治練達，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情形，間接地對選民的黨派投票抉擇與投票取向，發生影響作用。

六、結論與討論

本文嘗試從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概念，來說明選民可能應用作為處理選舉情境訊息的一種心理機制，並從政治認知的角度來看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首先，我們發現投票的選民顯然比不投票的選民，具有比較豐富的黨派思維結構體；而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較高的選民，不僅對政黨的偏好或立場的支持，都比較有強烈程度的表示，同時，對政黨正反面印象的言詞描述，

也比較不會用模稜兩可的字眼。其次，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對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政黨印象(國民黨、民進黨及兩黨的印象差距等)及政治練達水平等，均具有顯著的淨影響效果。第三，選民的省籍差異與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兩黨印象差距等黨派的心理特徵，是決定選民黨派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然而，選民根據何種原因來作投票考慮的投票取向所以不同，則取決於選民的性別、政黨認同、兩黨印象差距，以及政治認知因素的政治練達水平等差異。最後，我們也發現選民的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情形，對黨派投票抉擇與投票取向，雖沒有直接的影響作用，但透過影響黨派的心理特徵，而具有間接與居中的影響效果。

從上述黨派思維結構體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推論：雖然臺灣缺乏深厚的政黨政治的文化與傳統，但在競爭性政黨政治萌芽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隨著選舉與政黨競爭的規模擴大，選民的腦海中已經逐漸發展出「黨派思維結構體」，而用之於政治性(尤其是黨派性)訊息處理的思考與推理上。以此而言，雖然選民的「政黨認同」在當前政治情勢中，並不能像美國的情況一樣，用「自我認定」的方式直接了當地測量出來，但這並不等於臺灣的選民就沒有黨派的心理傾向；他們仍然相當普遍地應用黨派思維結構體，而根據他們對政黨的知識結構，來吸收處理政治訊息，以作政治上的思考與推理。從黨派思維結構體應用程度與政黨認同「強度」具有顯著的影響關係中，也說明政黨認同較強烈的選民，無論是認同於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也都具有較完整豐富的黨派思維結構體。由此可見，臺灣的選民，隨著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展開與選舉的規模擴大，也逐漸在心中具有「黨派性」(partisanship)的傾向，而漸漸發展「黨派思維結構體」。

以選民的政治認知來看政治練達水平，所強調的不在於意識型態的「概念化水平」，也不必只限於從政治態度與信念的一致性角度，而是從客觀的政治認知與行為參與的基礎上，來看選民的一般政治認知的「質性」。當然，選民的政治認知程度以政治練達水平來看時，因選民的性別、年紀、省籍、教育程度與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應用程度不同，而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同

時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政黨印象的差異等黨派心理特徵，也決定了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選民的政治練達水平有助於了解選民投票取向的主要差異為何：政治練達水平以政見議題投票的選民為最高，政黨取向投票的選民居次，再次是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而以人際及社會網絡投票的選民為最低。換句話說，政治練達水平較高的選民，政治思維結構體(議題的、黨派的或候選人的思維結構體)較豐富、較完整，因而據以作投票考慮的推理；然而，政治練達水平較低的選民，比較傾向於依賴人際及社會網絡而來的訊息，以作投票決定的考慮。黨派思維結構體與政治練達水平，有助於我們了解選民在面對選舉情境中充滿黨派的政治訊息時，究竟依賴何種政治思考與推理上的「啟發」或判斷捷徑，以作成投票行動的選擇。這與選民是否傻瓜，應無必然關係，更無須作「選民只有十三歲」這種不必要與無關的假定與想像。

(收稿日期：1994年7月13日；接受刊登日期：1994年8月26日)

註釋

- 1 這方面的最近發展，讀者可參考Lau and Sears(1986)以及Kuklinski et al.(1991)的辯論，以及從這些文中的參考書目，可以對當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獲得一個梗蓋性的了解。
- 2 例如，Lau(1986)以美國全國性選舉的調查資料分析選民的政治認知，即發現選民的政治思維結構體是以議題、團體、候選人或政治人格、以及政黨為主；而Hamil, Lodge, and Blake(1985)的分析，則指出「貧富」階級、政黨與意識型態等，乃是民衆用以了解政治世界的政治思維結構體。當然，除了政黨、團體、政治人格、政治議題、階級及意識型態等對象之外，一般的民衆或許也以性別、種族以及其他的議題範疇，來認

識政治世界而成爲政治思維結構體。例如，Bolland(1980)將種族關係、市政服務、經濟、都市計劃、交通、健康保險與教育等七種議題，列爲政治思維結構體的可能對象。然而，當前政治認知的研究，都不免以選民的投票行爲研究對象，因此，也以傳統上所強調的政黨、候選人與選舉議題等影響投票行爲的因素，來作爲探討選民的政治思維結構體的主要所在。

- 3 所謂「Q方法」(Q methodology 或稱Q sort)所指的是，從問題回答內容的特質，來找回答者之間關係的一種統計上的方法。一般的因素分析以回答者出發，來找問題回答內容特質之間的關係，而稱爲「R方法」。「Q方法」剛好是一種相反方式，以問題回答內容特質來歸類回答者的一種統計上因素分析方法。Conover and Feldman(1984)以這種「Q方法」來測量與認定政治思維結構體。關於「Q方法」的統計方法與應用，詳細情形可參見Brown(1980)。
- 4 自Campbell等人的《美國選民》在1960年出版，及Converse的〈大眾信念體系的本質〉一文中在1964年發表以後，所謂「概念化水平」與「政治練達水平」(也稱爲「態度結構」或「信念系統的束縛」)之研究，就成爲民意與政治心理學研究的重心之一，相關的研究文獻或從本質上的探討，或從測量與效度問題著手，可說不勝枚舉。最近包括實質上與測量上的相關探討，可以參見Hagner and Pierce(1983), Knight(1985), Luskin (1987, 1990)與Wyckoff(1980, 1987a, 1987b)。
- 5 Miller and Asp(1985)在探討美國與瑞典選民對媒體訊息的處理時，即以「政黨認同」來間接地測量選民「黨派思維結構體」的豐富程度。後來，Miller(1986)更將「政黨認同」視爲是等同於「黨派思維結構體」的測量指標。

附錄一

一、政黨偏好與政黨支持的測量

(一) 政黨偏好：

目前國內有兩個主要政黨，一個是國民黨，另一個是民進黨。請問在感情上您比較傾向接受那個政黨？

(1) 國民黨【請問您傾向國民黨的程度如何？】(強烈、中度、輕微)

(2) 民進黨【請問您傾向民進黨的程度如何？】(強烈、中度、輕微)

(3) 不偏向那一個政黨

(4) 其他(請註明)

(二) 政黨支持：

目前國內有三個常聽到的政黨：國民黨、民進黨、中華社民黨，他們各有不同的政治主張。請問您覺得那一個政黨的政治主張，跟您的看法比較接近？

(1) 國民黨【請問您接近的程度如何？】(非常接近、接近、有些接近)

(2) 民進黨【請問您接近的程度如何？】(非常接近、接近、有些接近)

(3) 中華社民黨【請問您接近的程度如何？】(非常接近、接近、有些接近)

(4) 不接近那一個政黨

(5) 其他(請註明)

二、政黨印象的測量

現在社會上有兩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不同的人對他們有不同的看法，請問您的看法為何？(原問卷有十道問項，但本文的分析僅選擇下列四種，常為對立政黨攻訐對方的議題項目來加以測量)

在人權保障上：

(國民黨/民進黨)是重視人權的政黨，還是忽視人權的政黨？

(1) 重視人權的政黨，(2) 忽視人權的政黨

(3) 有時重視有時忽視(4) 其他(請註明)

在貪污與腐化的問題上：

(國民黨／民進黨)是縱容貪污腐化的政黨，還是打擊貪污腐化的政黨？

(1)縱容貪污腐化的政黨(2)打擊貪污腐化的政黨

(3)有時縱容有時打擊(4)其他(請註明)

在特權的問題上：

(國民黨／民進黨)是打擊特權的政黨，還是玩弄特權的政黨？

(1)打擊特權的政黨(2)玩弄特權的政黨

(3)有時打擊有時玩弄(4)其他(請註明)

在利益代表上：

(國民黨／民進黨)是代表有權有勢者的政黨，還是代表一般民衆利益的政黨？

(1)代表有權有勢者的政黨(2)代表一般民衆利益的政黨

(3)兩者都有(4)其他(請註明)

三、政黨政治價值的測量

(「很同意」到「很不同意」五個刻度)

(1)有強而有力的反對黨，政治才會進步。(＋)

(2)參加反對黨的人，他們的愛國情操是值得懷疑的。(－)

(3)如果國民黨不能獲得選民支持，就應變成在野黨。(＋)

(4)政黨競爭有礙政治的安定。(－)

四、投票取向的分類

選民投票取向的測量題目，乃是詢問投票的選民為什麼投票支持所圈選的候選人：「在這次選舉，您所接觸或聽過的候選人一定很多，請您仔細想一想，最後是爲了什麼原因投票給您所選的候選人？(最多選三項，並請依重要等第排列)」這些答項被選爲第一重要原因爲主的次數與百分比分配如下：

選項	次數 N	百分比 %
(01) 原來與候選人直接認識或有關係	42	4.2
(02) 聽從家人或親戚的建議	102	10.3
(03) 聽從同學、朋友、師長的建議	27	2.7
(04) 自己所服務的機關或任職的公司大力支持這位候選人	8	.8
(05) 鄰里長、鄰居或地方上有名望人士的拜託	20	2.0
(06) 自己所屬政黨的囑託	19	1.9
(07) 候選人與自己同屬一個政黨	22	2.2
(08) 因為候選人過去的成就或對地方上的貢獻	196	19.8
(09) 因為候選人的能力與條件（學識、品德、風度等）	242	24.4
(10) 贊同候選人的政治立場、主張或見解	124	12.5
(11) 為支持某一政黨	50	5.1
(12) 為反對某一政黨	9	.9
(13) 候選人與自己有相同的出生背景（同鄉、同宗等）	32	3.2
(14) 在地方上與候選人同一派系	2	.2
(15) 回報候選人的人情	5	.5
(16) 接受過候選人的好處	6	.6
(17) 因為這個候選人選情比較危急特別需要我這票	6	.6
(18) 其他（請註明：）	78	7.9*
有效回答選民人數	990	100.0

這雖是多重的選項問題，但為了分析上的理由，我們以回答為「第一重要」的投票原因為主，但假定在第一重要的回答中選「其他」項為理由的，我們則以他第二重要的原因來替代，然而若在第二重要的回答中，仍以「其他」項為理由，則以第三重要的原因為替代。最後，三種都以「其他」項為理由，同時並沒有註明理由的，人數與百分比如上表「*」所列的「其他」一類。

我們按投票原因的性質與內容（不能歸類的「其他」則捨去），最後歸納成下面的投票取向類型：

（一）人際與社會網絡關係投票：

- (01) 原來與候選人直接認識或有關係
- (02) 聽從家人或親戚的建議

- (03) 聽從同學、朋友、師長的建議
- (04) 因為自己所服務的機關或任職的公司大力支持這位候選人
- (05) 鄰里長、鄰居或地方上有名望人士的拜託
- (13) 因為候選人與自己有相同的出生背景(同鄉、同宗、同省籍等)
- (14) 在地方上與候選人同一派系
- (15) 回報候選人的人情
- (16) 接受過候選人的好處
- (17) 因為這個候選人選情比較危急特別需要我這票
- (二) 候選人取向投票：
- (08) 因為候選人過去的成就或對地方上的貢獻
- (09) 因為候選人的能力與條件(學識、品德、風度等)
- (三) 政黨取向投票：
- (06) 自己所屬政黨的囑託
- (07) 候選人與自己同屬一個政黨
- (11) 為支持某一政黨
- (12) 為反對某一政黨
- (四) 政見議題取向投票：
- (10) 贊同候選人的政治立場、主張或見解

附表 投票取向的分配

投票取向類型：	人數	百分比	調整後
人際與社會網絡關係投票	250	25.3	27.4
候選人取向投票	438	44.2	48.0
政黨取向投票	100	10.1	11.0
政見議題取向投票	124	12.5	13.6
不能歸類	78	7.9	---
	990	100.0	100.0
有效歸類總人數	912		

參考資料

徐火炎

- 1993 〈選民的政黨政治價值取向、政黨認同與黨派投票抉擇：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選民的投票行爲分析〉，《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3(2)：144-166。

Axelord, Robert

- 1973 "Schema Theory: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248-1266.

Barton, Alan H. and R. Wayne Parsons

- 1977 "Measuring Belief System Struct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1: 159-180.

Bennett, Stephen E.

- 1989 "Trends in Americans' Political Information, 1967-1987,"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7: 422-435.

Berelson, Bernard R.

- 1952 "Democratic Theory and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6: 313-330.

Bolland, John M.

- 1980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gnition: A New Approach to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Political Behavior* 3: 248-265.

Brown, Steven R.

- 1980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pplications of Q Method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Conover, Pamela Jonston and Stanley Feldman

1984 "How People Organize the Political World: A Schematic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95-126.

1991 "Where is the Schema? Critiqu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1364-1369.

Converse, Phili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 in David Apter(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and Scott Keeter

1991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U.S. Public's Knowledge of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 583-612.

Fiske, Susan T. and Patricia W. Linville

1980 "What Does the Schema Concept Buy U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 543-557.

Fiske, Susan T. and Donald R. Kinder

1981 "Involvement, Expertise, and Schema Use: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Cognition," in Nancy Cantor and John F. Kihlstrom (eds.), *Person-
ality, Cogni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Fiske, Susan T., Donald R. Kinder and W. Michael Larter

1983 "The Novice and the Expert: Knowledge-Based Strategies in Polit-
ical Cogni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 381-400.

Ginsberg, Benjamin

1986 *The Captive Public: 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Hagner, Paul R. and John C. Pierce

1983 "Levels of Conceptualization and Political Belief Consistency," *Micro-politics* 2: 311-348.

Hamill, Ruth, Milton Lodge and Frederick Blake

1985 "The Breadth, Depth, and Utility of Class, Partisan, and Ideological Schemat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850-870.

Holyoak, Keith J. and Peter C. Gordon

1984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Robert S. Wyer, Jr. and Thomas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Key, V. O., Jr.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nder, Donald R.

1983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in Ada W. Finifter(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Knight, Kathleen

1985 "Ideology in the 1980 Election: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Does Matter," *Journal of Politics* 47: 828-853.

Kuklinski, James H. Robert C. Luskin and John Bolland

1991 "Where is the Schema? Going Beyond the 'S' Word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 1341-1355.

Lau, Richard R.

1986 "Political Schemata, Candidate Evalua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Richard R. Lau and David O. Sears(eds.),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19th Annual Carnegie Symposium on Cogni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Lau, Richard R. and Ralph Erber

- 1985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Perspective," in Sidney Krauss and Richard M. Perloff (eds.),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hought: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Lau, Richard R. and David O. Sears

- 1986a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19th Annual Carnegie Symposium on Cogni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1986b "Social Cognition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n Richard R. Lau and David O. Sears(eds.),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19th Annual Carnegie Symposium on Cogni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Lazrus, Richard S.

- 1984 "On the Primacy of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 124-129.

Lippmann, Walter

-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Luskin, Robert C.

- 1987 "Measur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 856-899.

- 1990 "Explain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2: 331-361.

Miller, Arthur H.

- 1986 "Partisan Cognitions in Transition," in Richard R. Lau and David O. Sears(eds.), *Political Cognition: The 19th Annual Carnegie Symposium on Cogni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Miller, Arthur H. and Kent Asp

- 1985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From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idney Krauss and Richard M. Perloff(eds.),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hought: 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Sniderman, Paul M., Richard A. Brody and Philip E. Tetlock

- 1991 *Reasoning and Choice: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yckoff, Mikel L.

- 1980 "Belief System Constraint and Policy Voting: A test of the Unidimensional Consistency Model," *Political Behavior* 2: 115-46.
- 1987a "Measure of Attitudinal Consistency as Indicators of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A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49: 148-168.
- 1987b "Issues of Measuring Ideological Sophistication: Level of Conceptualization, Attitudinal Consistency, and Attitudinal Stability," *Political Behavior* 9: 193-224.

Voter's Political Cogn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Huoyan Shyu

Abstract

This essay adopts the concepts of “partisan schema” and “level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to explore how voters process voting cues in elections. Along with the emerging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not only have elections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among parties but voters have also been imbued with more partisanship since the 1980s. There has been a weak partisanship in Taiwan, a Confucian society with one-party dominant system. Nevertheless Taiwanese voters have increasingly processed voting cues and cast their votes by their party preferences in post-authoritarian elections. Based on analyzing a survey data of the Second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it is found first that sex and education are predictor variables of voters’ use of partisan schema and their levels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Secondly, both the use of partisan schema and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are found correlated with the strength of party preference and support, and they are also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 shaping of individuals’ voting-orientations and partisan vote-choices. Findings on voters’ use of partisan schema and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would shed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voters’ shortcut or heuristics in political reasoning and vote-choice making.